

文史研究

1990年第2期

山西省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编辑部

文史研究

1990年第2期
(总第9期)

目 录

·专题研究·

- 嘉康杰对中共河东党组织的贡献 景惠西 景敏菊 (3)
嘉康杰入党时间之我见 谢殿铎 (11)

·抗战史研究·

-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上党银号
及上党银号币的发行 田秋平 (15)

·阎锡山研究·

- 阎锡山的精神建设委员会 杨怀丰 (20)
略谈“中说”兼述梁漱溟与阎锡山 郭汾阳 (25)

- 人 物 明代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 周庆义 (27)
春 秋 樊象离事略 贾献容 (40)
-

• 考证 •

- 续西峰生卒时间及其它 陈应谦 陈南星 (45)
-

• 三晋文史 •

- 李世民柏壁屯兵与平定河东 张俊圭 张晓玲 (51)
-

• 文史拾遗 •

- “宋案”凶手武士英 刘大卫 (54)
-

• 译文选登 •

- 山西的军阀阎锡山 (续五) [美]唐纳德 G·季林著

[刘心显] 牛长岁 宋美云 陈文秀 译校 (56)

主 编：王定南

副主编：霍成勋

编 辑：张全盛 肖利平 许冰 张志斌

一九九〇年六月

嘉康杰对中共河东 党组织的贡献

景惠西 景敏菊

嘉康杰（字寄尘）是河东民主革命先驱，是中共河东地方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教育家，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对中共河东地方党组织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1911年辛亥革命时，嘉康杰投笔从戎，随光复军五路招讨使李岐山部，南征运城，北攻临汾。革命战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从1912年起，先后就读于山西省立太原农业专科学校、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科、北京大学政法学院，直到1921年第二次留学日本回国。

回到家乡，山西当局对他十分器重，想聘他做官。而他却认为，在封建军阀卵翼下，“当官无好人，好人不当官”，不愿趋炎附势，去做坑害庶民百姓的赃官。于是，他屈蛰故里，在嘉家祠堂创办“以太小学”，从此，开始了为时12年的教育生涯。

他从1922年到1933年，先后在夏县、运城、太原和临汾等地，创办小学1所，中学6所，培养进步青年近千人。其中不少成了河东地区党的领导骨干。如李尔明，1927年就担任了中共安

邑第一任县委书记；金长庚，从1929年入党时起，就一直是河东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以后还成为本区民主政权的第一任专员；李仰南、关中廷、曹金海、李荣、张子英等也分别成为新绛、垣曲、绛县、虞临永建党早期的负责人。还有一些，以后成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嘉康杰办学之初，指导思想就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河东青年培养成革命的一代。这从他所办学校的校名就可看出。“以太小学”中“以太”一词是十八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界流行的一种假说，认为“以太”是世界的本源，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以太”的结晶。嘉康杰用“以太”作校名，表明他要用科学思想启迪蒙童，要摒弃封建糟粕对蒙童的毒化。“平民中学”中的“平民”，是指普通老百姓。当时，能读起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他创办平民中学，就是为让穷人子弟能有个读书的机会。他在招生简章中规定“骑马的不要，坐轿的不要，穿旗袍的不要，戴礼帽的不要。欢迎平民子弟来校就读”。“河东中学”中的“河东”，是指河东地方，这里天华物阜，人杰地灵，不乏有志之士，不乏革命传统。他要把河东青年培养成反对阎锡山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者。河东中学创办不久即被查封，嘉康杰也因“莫须有”罪名，下运城监狱。“中山中学”是嘉康杰1927年5月从狱中出来后创办的，一所在运城，一所在太原。他在创办中山中学的《建校舍募捐启》中写道：“创办中山中学，意在培养革命青年实现三民主义”。尽管校名变来变去，阎锡山清楚，嘉康杰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就是要革封建军阀、封建专制的命。所以嘉创办的学校，后来全被山西反动当局查封了。

嘉办学宗旨主要有下述几方面：

第一，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从课程设置看，除一般中学课程，他还专门安排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并亲自讲授。意在激发学生的爱国救国思想。在校长、教师选聘上，他聘的都是当时

的进步人士，如景梅九、尉子嘉、张国瑞、崔斗辰、张稼夫、徐亚桑、吴仲六等，还聘有他培养出的学生金长庚、赵万忠、李仰南、毛无畏、韦献典、樊憎等。进步教师的聘用，保证了办学的方向。为拓宽学生视野，他给学校购进大批进步书籍。其中有传播马列主义、克鲁泡特金学说、达尔文进化论、孙文学说等方面的；还有广东出的《大革命时期》、《胡适文存》及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普希金、易卜生等人的名著；还有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1929年初，河东党员乔子甲由苏联中山大学结业回国，康杰请他写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作为学校教材。进步的教师和进步的精神食粮对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发挥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第二，培养学生树立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1922年，创办夏县堆云洞平民中学时，他秉笔书写“劳工神圣”牌匾悬挂讲堂，以示训诫。为解决教学经费，他领学生耕田种地，这样既解决了经费困难的问题，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他常教诲学生：“生产劳动是资本，游手好闲是死路。”1925年夏，平民中学由夏县往运城胡家巷搬迁时，他用自己家的车和学生一趟一趟地往返运送，直到搬完。身教胜于言教，嘉康杰身体力行，对学生劳动观念的培养和树立，起到了深刻的教育作用。

第三，指导学生在社会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从1922年起，他先后带领学生进行过下述斗争：反对夏县劣绅田溉西贿赂群众给夏县知事吴光裕送“万民伞”；反对阎锡山扩充军备、增加房税，痛打了助纣为虐的夏县劣绅吴守仁、张庭栋，吓跑了县长张柳星；反对阎锡山增加盐税，斗垮了县长丁绳武；多次反对夏县国民党清党委员秦中兴等。此外，他还组织学生进行纪念“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等活动。正由于嘉康杰在办学育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他成了河东教育界的知名人士。1945年，

崔斗辰撰写的《嘉寄尘传略》中说：“嘉寄尘烈士在五四运动后，是山西河东一带文化启蒙运动的急先锋。”

二

中共河东地方党组织创建于1926年，嘉康杰担任河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重任是在1930年。当时正值立三路线时期，环境十分严峻。加之在此之前，河东党的组织已连续两次遭到大破坏。第一次大破坏是1927年冬，河东各县党的负责人大都被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以“跨党分子”名义开除国民党籍，有的被捕，有的外逃，有的消极，能够坚持斗争的已经不多。第二次大破坏是1928年春夏，中共山西省委巡视员周毓麟霍州会议后到晋南巡视，在新绛纱厂被叛徒马立功出卖，各地党员联络名单和通讯地址被敌人搜走，敌人按名单捕人，致使河东地方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到1929年，能在河东坚持的党员已为数极少。就在这一年，河东特委和特支（是年6月，河东特委根据上级指示，改组为河东特支）负责人冯彦俊、范希蠡相继调离和被捕，这时在河东坚持的只有嘉康杰领导的中山中学支部。这样，党的领导重任落在了嘉康杰肩上。

1930年前后，山西党的负责人汪铭和冯彦俊相继被捕，河东地方党组织与上级完全断了联系。这时，嘉康杰也遭到通缉，他被迫离开中山中学，把党的机关迁到中条山韩家岭；同时在闻喜小郭店学校建立了党的通讯和印刷处；并利用师生关系，从事恢复发展党组织工作。为了联系方便，嘉康杰让他的学生李仰南脱离教师职务，担任河东地方党组织联络员。那时，平民、河东、中山中学的学生散布河东各县，多思想进步，愿意革命。嘉康杰就利用这些条件，到处奔走宣传，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经过不懈努力，他先后在夏县、安邑、解县、虞临永、闻喜、新绛、绛县、垣曲和襄陵恢复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三、四十人。

这段恢复组织的工作十分艰辛，除了冒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还得风餐露宿住破庙。嘉康杰知难而进，毫不气馁。到1930年夏，河东情况有了好转，也与上级取得了联系。中共山西特委派员巡视后，决定成立中共河东中心县委，由康杰任书记。是年冬，中共北方局打算利用蒋阎冯大战机会，在山西组织十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山西建成江西第二。为了加强领导，决定重新恢复山西省委，在河东成立特委，由嘉康杰任特委组织部长，书记由原山西特委书记习从真担任。习从真任职不久，因病离去，河东党的工作实际由康杰负责。

1931年，由于左倾盲动，山西党的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天章、阴凯卿、汪铭等数十位同志惨遭杀害。河东地区也因组织稷王山暴动夭折，致使李仰南、白天鹤被捕，嘉康杰、金长庚被夏县政府通缉。在此困难局面下，康杰仍协同中共山西临时特委组织部长、河东特派员阎子祥，活动在河东各县。到1933年，河东三十六县中的三十二县，建立与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1934年初，阎子祥到太原汇报工作时被捕，河东与上级组织又一次失去了联系。但是，嘉康杰仍旧坚持在河东地区。1936年，他在敌人重赏通缉下，仍活动在群众中，并在闻夏山区农村先后建立起五十多个支部。

从河东党组织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康杰是怎样把党的种子由青年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又传播到最广大的穷苦百姓中，并使之在人民群众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三

大革命失败以后，嘉康杰开始在河东地区组织武装斗争。他把在运城监狱中结识的难友兰玉山、胡永福等发展为党员，做为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打算首先在闻喜、夏县山区建立武装斗争

根据地。据乔子甲在《忆康杰》中说：“我于1928年冬由苏联归国，请准中央派回晋南作农村工作，到运城和冯天祥接头，……我们商议相偕到夏县其毋村与康杰同志见面共同商议，把晋南党组织活动由猗氏迁往夏县，利用闻夏山区，运用毛主席在江西的办法武装农民，开展游击，建立根据地。康杰同志对此甚为兴奋，表示坚决勇敢执行。”1929年农历三月初五，为了搞到枪支，嘉康杰派兰玉山、金长庚、张沛霖等到平陆东山冯卓、枣园一带，设计收缴了任麟角等四户土豪劣绅的6支枪，创建了党领导的河东第一支武装力量。*将山东起*。*拟问*

1930年初，嘉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天津参加军事训练，5月返回河东地区。从此，他对武装斗争更加重视。他在闻喜发动饥民暴动未成，又到垣曲同关中廷一起到余家山察看地形，为将来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准备。1931年，他还准备利用稷王山农历九月十六日姜嫄庙会举行武装暴动，亦中途夭折。但他并不灰心丧气，并在绛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五条决定：（1）深入发动群众；（2）搜集武器，建立武装组织；（3）以回马岭为中心创建根据地；（4）教育党员认清有利形势，做好保密和防敌人破坏的工作；（5）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群众打击土豪劣绅。1934年，在嘉康杰指示下，经中共绛县县委书记曹金海做工作，争取了河南一批药商，约四十余人枪，于农历三月十二日利用华山庙会举行了武装暴动，正式宣告了中共绛县红军游击队的成立。

1936年2月，红军为北上抗日，东渡黄河来到山西。为配合红军，嘉康杰在夏县花嘴岭召集金长庚、冯仰义、梁福才、曹金海等开会决定：3月27日，举行中条暴动，成立晋南红军游击队，由嘉康杰任总指挥，曹金海任副总指挥，并通知闻、夏、平、垣及各县党组织。因红军回师陕北，历时8天的中条暴动遭到镇压。敌人悬赏一千元通缉嘉康杰、五百元通缉金长庚。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在中条山区的群众中播下了火种，使群众知道了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来到河东地区，党组织派嘉康杰为八路军扩兵开展工作。在短时间里，他便为八路军扩兵数百人。1938年春，他被党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6月重返河东地区工作，担任中共晋豫特（地）委委员、军事部长、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供给部长、第六大队政治主任、第七大队队长等职。他带领八路军游击队战斗在中条山区，配合主力部队和友军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

四

大革命时期，河东地区党组织一建立，全体党员就遵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县（市）党部的名义，于1927年，先后发动组织了运城五一大游行、安邑驱逐贪官县长郑裕孚、新绛纱厂工人为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及猗氏县八一农暴等运动。这些活动和斗争，尽管轰轰烈烈，影响颇大，但广大群众并不清楚是河东共产党所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又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名义，领导河东地区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穿的是阎锡山的军装，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再有，国民党把共产党说成是一伙“共产共妻”的“共匪”，使那些老实纯朴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交道的河东群众听而生畏。从党自身来说也有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河东党组织在初创时期，率先入党的大多数是一些名不见经传，年龄仅十几岁到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影响极其有限。因此，他们从事的事业，在短时期内，很难为人民群众认识与了解。

河东群众对共产党的第一次认识，是国民党的“清党”和大屠杀。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中，河东群众认清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也朦胧地看到了那些所谓“乳臭未干，被共产主义邪说所诱惑、迷了心窍走入歧途”的青年们，并不象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

那样。此时，第一个站出来，同“清党”唱反调的就是河东名士嘉康杰，他不仅走到了这群青年之中，并加入了由他们创建起来的中共河东地方党组织，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在他影响下，金长庚、李仰南、兰玉心、胡永福、关中廷、曹金海、白涛、张子英、李荣等一批新鲜血液输入了当时岌岌可危的河东党组织的肌体，他以自己的行动，宣告了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正义的。接着，他踏遍河东，使党组织的星星之火，燃遍河东大地。

从河东党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嘉康杰在人民中的广泛活动和榜样作用，使河东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得到了扩大和提高。

康杰同志的榜样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嘉康杰自1927年冬入党，到1939年11月18日在中条山牺牲，长期坚持战斗在河东地区，是河东党内本区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同志。他不为残酷环境所折服，也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对革命理想和信念的执着，正象他于1927年5月，出阎锡山监狱时所讲的：我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行吾心之所安”为座右铭的。

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了理想、信念和革命的成功，嘉康杰奉献了他的一切。他把自家的地契烧毁，田地分给佃农，房子因参加抗战被日寇烧光。有年冬天，妻子给他做了九条棉裤，他都送给了同志们，自己却在寒冬腊月穿着单裤指挥战斗。他的儿子，死于困苦之中；女儿，送往延安，参加了革命。他贪财的叔父与他断绝了关系；他的父亲说他是忤逆不孝；他的一些富豪亲属却充作内奸，企图把他献给敌人。然而，他却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为党树立了光辉的形象。

第三，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嘉康杰常对人说：“资产阶级凭的是金钱大炮，我们共产党则凭得是人民群众。谁脱离群众，谁就会失败。我读《东来博议》，只记住两句话，‘彼之诈虽千而不足，我之诚虽一而有余’，我们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对待人民群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他一次次脱险于危难之中，所靠的也正是人民群众的保护。

嘉康杰牺牲后，《新华日报》（太岳版）《悼念嘉寄尘》一文指出：“他不仅是我们党内能得人推崇的领导者，而且是晋南一带十万群众所最可信赖的伟大的群众领袖。在中条山内外，远近数百里，一提到嘉寄尘的名字，虽老妇孺子无不应声赞誉。真正象这样获得广大群众拥护的群众领袖，在我们晋豫区，有如寄尘同志的，实在不可多得。”这是对嘉康杰同志的公允评价。嘉康杰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人民群众，“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从而赢得了河东人民群众对党的爱戴与拥护。

嘉康杰入党时间之我见

谢 殿 锋

嘉康杰（字寄尘）烈士是晋南闻名的老革命家和共产党员，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卖国贼袁世凯、亲历“五四”运动。留学日本归国后，兴办教育，反对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在晋南民中有很高的声望。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白色恐怖下，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斗争。抗战爆发后，他在河东地区积极奔走，为胜利地完成党中央领导向山西省委提出的“二十天扩军三千”的艰巨任务，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9年，嘉康杰被选为当时晋豫

区出席党的“七大”后补代表。同年12月，在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关于嘉康杰的入党时间问题，长时间众说不一。现把对他的入党时间之各种不同意见及我个人的看法，介绍于后，以期将这一问题进一步搞清楚准确，这对研究晋南党的历史是有裨益的。

目前关于嘉康杰的入党时间归纳起来约有六种说法：

一、嘉康杰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由刘公博介绍入党的。这一说法没有其他材料可证。据查，嘉康杰第二次从日本留学回国是1920年底或1921年初，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再者，中共党史上并没有刘公博此人。因此说嘉康杰在留学日本期间入党是不可能的。

二、1926年末至1927年春入党。该说法说1926年9月，嘉康杰因与国民二军有联系被捕，与刘天章（曾在国民二军学生队任队长）关在一个牢房。刘天章在狱中对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介绍嘉入了党。并告其出狱后继续以办学为掩护，不要与地方党发生关系。此说，也缺乏佐证。经查《刘天章传》和刘天章的档案材料，刘在这期间，没有在运城或山西其它地方被捕和坐过监狱。而是1927年7月后，在西安被捕，随即被押解至河南洛阳及郑州监狱，1928年底出狱。这与运城毫无关系。再说有材料说嘉康杰在运城被捕和坐监狱，于1927年夏初即已出狱，这比刘天章在西安被捕的时间早两三个月，二者在时间上也不吻合。

三、1927年暑假入党。该说法说1927年春末夏初，嘉康杰出狱，就在这一年暑假期间，由王鸿钧同志（王鸿钧去武汉时路经运城或堆云洞）介绍嘉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1928年至1929年春入党。持这种说法的人理由是：1928年上半年以前，嘉康杰思想是进步的，同情共产党，反对反动统治阶级，但当时还没有入党。1928年6月在河东特委成立大会上，负责人（冯彦俊）给参加会议的党员介绍说，他（指嘉）是

我们的同情人。另一位1927年前入党的党员说：我1927年8月，因受国民党追捕，跑到中山中学嘉康杰那里，由他掩护我逃离运城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还有人说，1929年汪铭在堆云洞召开党员会（河东特支干事会成立）时，嘉康杰参加了会议。再是嘉康杰1929年春和以后曾介绍数人入党，而1928年以前，没有介绍过任何人入党。因此，认为嘉康杰入党时间以1928年底或1929年初比较可靠。

五、1929年6月入党。该说指出，1929年6月2日，汪铭到了运城，了解情况后，找到了运城中山中学校长嘉康杰，对他进行了考查，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

六、较多人的说法是1927年冬至1928年春入党。其中，有的人讲，1927年嘉康杰由汪铭同志介绍入党后，一贯积极负责为党工作。还有人说，1927年5月嘉康杰出狱后，到太原办了中山中学校。中共山西省委立即派王鸿钧到该校任教，经过接触和了解，知嘉已经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倾向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便向省委作了汇报。汪铭同志决定找嘉谈话，在中山中学的一间小房子里，汪铭与嘉康杰见面了。汪铭向嘉康杰介绍了党的性质和纲领。讲述了目前的中国时局及党的方针，还将一些党的文件让嘉阅读，随后就介绍嘉入了党，时间是1928年春天。

据嘉康杰的胞弟嘉红元（现名张永）讲：“1927年寒假（1928年1、2月）在太原中山中学（原博文中学），他（指嘉康杰）把我介绍给汪铭同志。……从此，省委的一些机密文件、印刷宣传品等，即由这里发出。”

1928年10月在太原中山中学由王振汉（汪铭的化名）介绍入党的赵万忠同志也讲：“嘉康杰当时已经和王振汉很熟悉了，他入党比我早，至少在1927年后半年。”

还有一位由嘉康杰1930年介绍入党的同志讲：“老嘉是1928年春天，在太原由汪铭介绍入党的。”

1940年1月1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的温建平同志悼念嘉寄尘遇难的文章中说：“嘉康杰1927年冬参加了党后，即历任支书、县委、特委……”。

此外，从查阅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嘉康杰材料的记载情况看，两份《嘉康杰传略》材料（作者均为崔斗辰、刘晓天，时间为1945年1月10日，地点是党校）：一份讲“嘉是大革命时期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另一份讲：“嘉到1927年冬才正式加入共产党，1928年才有了布尔什维克的正式组织关系”。在一份《抗战时期干部牺牲表》上，则填为“嘉寄尘，男，50岁，山西夏县人，知识分子……1927年冬天入党……”

笔者认为，嘉康杰于1927年冬天或1928年初春，在太原中山中学由汪铭和王鸿钧共同介绍入党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

第一、这种说法有较早的和比较可信的档案材料依据。如¹1940年1月（嘉康杰遇难牺牲后一个月）《新华日报》（华北版）悼念文章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传略》及“抗战期间干部牺牲登记表”等档案材料，这虽还不是本人自己直接填写的材料，但却是当时比较知情的人所提供。应当说是比较可信的。

第二、这种说法与当时山西党组织的历史情况，特别是与大革命失败后，汪铭同志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山西党组织的情况大体吻合。根据当时环境和嘉康杰的特殊身份等情况，在1929年以前，嘉只同省委个别同志联系，没有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没担任党内职务和发展党员，也是合乎情理和可以理解的。

第三，这种说法，也比较符合嘉康杰同志本人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情况。

虽然，笔者认为嘉康杰的入党时间，以1927年冬或1928年初春较可靠，但还不是证据确凿的定论。因此，希望知情人和党史研究者，继续发掘新的材料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最后搞清嘉康杰同志入党的确切时间和取得统一的认识。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 上党银号及上党银号币的发行

田秋平

上党银号的成立及其任务

1938年4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团结各方抗日力量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是，由于根据地大都建在各县的交界或游击区等偏僻地区，经济极端落后。又由于抗战开始晋省政治中心西迁，省办各银行号总管理处撤往西安，晋钞在全省各地周行，涨落靡足，钞票破烂模糊，无人过问，失去兑换职能。加之日军长期集中其侵华主要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残暴的大规模的反复扫荡，进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四面受敌包围，与敌占区的贸易几乎中断。军民日用必需品食盐、医药、煤油、火柴等非常缺乏。“……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见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地步，根据地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百端待举，尤以通货问题最为紧迫。为了发展根据地内部经济，保障抗战的物资供应，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对敌展开经济斗争，粉碎敌人的封锁，保证根据地建设的开展。1938年8月，上党银号在当地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其掌握的地方政权——第三、第五行政专署支持下，于沁县郭村正式成

立。

上党银号总号办公地点设在郭村刘生旺院内北屋。该屋为楼房，上下共十间。上为经理办公室，下为银号各股所在地。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没有挂银号名称牌匾和任何标记。银号经理王贺五、副经理王干卿。下设发行股（股长李培荣）、会计股（股长刘大伦）、总务股（股长范烈候）和营业股四股。工作人员近20人，按部队供给制待遇，穿军装，每人每月津贴五元（上党币）。随着上党币流通范围的扩大，机构也有了大的发展。1940年初，银号先后在长治、辽县设分号，长治分号负责人李培荣，辽县分号负责人李大伦，不久李培荣调沁源设分号。经理王贺五具体领导、管理和监督各股及分号的一切业务。

上党银号对内的基本任务是发行纸币，活跃经济，筹划财务，扶持生产。由于根据地生产落后，抗战需要经费庞大等所造成的不平衡，特别是日伪经济封锁造成的财政困难。因此，根据地财政不得不主要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补助财政上的不足，保证根据地抗战和生产的顺利进行。

上党币的资金及其发行

上党币的资金，一部分靠根据地军民自行筹集，一部分是阎锡山拨给抗战部队的资金。薄一波同志1983年10月6日同《沁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编办人员曾谈到：“上党银号开始的资金，阎锡山不是给你们点钱嘛，八路军不是也有点钱嘛，开始就是这个资金，资金也不大……”。就是用这些资金发行了上党币，弥补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战时财政不足的困难。

上党币的发行是从银号成立就开始的。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938年版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种。其中一角券币面 11.2×5.7 厘米，雪青色，正面主图为铁路、森林。二角券两种版别，第一种币面 12.5×6 厘米，正面绿色，主图为沁县